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我所知道的 | WOSUOZHIDAODE
WANGWEIZHENGQUAN

汪伪政权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 | WOSUOZHIDAODE
WANGWEIZHENGQUAN

汪伪政权

罗君强 等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罗君强等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6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340 - 9

I. ①我… II. ①罗… III. ①汪伪政府 (1938) —史料
IV. ①K265. 65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4920 号

责任编辑: 梁玉梅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0.25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百年中国记忆·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太华

副主任 卞晋平 王国强 方 立 龙新民 刘德旺 孙庆聚
闵维方 陈光林 林淑仪 周国富 梁 华 谭锦球
翟卫华 陈惠丰 韦建桦 张研农 陈建功 南存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捷 王文章 王兴东 王怀超 左东岭 龙新南
叶培建 冯佐库 吕章申 邬书林 刘 春 刘兆佳
李 捷 李东东 李忠杰 杨冬权 励小捷 余 辉
汪 晖 张 皎 张廷皓 张晓林 陈 力 林 野
单霁翔 赵 卫 赵长青 俞金尧 施荣怀 袁 靖
聂震宁 黄书元 黄若虹 黄嘉祥 崔永元 梁晓声
彭开宙 葛晓音 韩 康 廖 奔

主 编 陈惠丰

副主编 刘晓冰 沈晓昭 张燕妮 刘 剑 韩淑芳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伟欣 马合省 王文运 牛梦岳 卢祥秋 刘华夏
刘 夏 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李晓薇 张春霞
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段 敏 高 贝
殷 旭 徐玉霞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



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

WOSUOZHIDAODEWANGWEIZHENGQUAN

CONTENTS 目 录

对汪伪的回忆 罗君强 / 1

汪伪巨奸派系之争 何国涛 / 73

南京汪伪的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 张润三 / 103

汪伪、伪满“建交”记 周逸峰 / 115

汪精卫新国民运动内幕 戴英夫 / 126

汪伪政权“建军”拾零 胡幼植 傅大兴 / 137

汪精卫“建军”记 曹玄庆 / 145

汪伪政训机构及其内情 方诚修 / 148

汪伪军事委员会报导室内幕 杨蔚云 / 157

沦陷时期的湖北伪政权 张世模 / 176

汪伪时期江西省情琐记 傅大兴 / 200

千里哀鸿说“清乡” 汪曼云 / 206

汪伪安徽“清乡”罪行录 张大荒 / 256

目 录 CONTENTS

我所知道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 胡宣同 / 262

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 金湛庐 / 273

1943年“粮食贪污案”真相 计锡林 赵天一 / 286

投敌附逆的傅筱庵 胡鲍洪 / 293

附 录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

杨 凡 译 / 313



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

WOSUOZHIDAODEWANGWEIZHENGQUAN

对汪伪的回忆

罗君强*

庐山谈话会

1937年7月，蒋介石、汪精卫想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知名之士”，见面谈心，以孤立中共，统一舆论，遂联名具柬，邀请他们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会上，蒋、汪并坐主位，张群任秘书长，曾仲鸣任秘书主任，我和陈方任秘书，无其他组织形式。发言是随便谈的，出席者当然以国民党人占多数。我大约记得参加的人如下：张君勱、曾琦、胡适、张伯苓、陈立夫、萨孟武、周佛海、梅思平、熊式辉、陶希圣、张肖梅、洪深、叶楚傖、高宗武……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团结御侮。汪精卫表面显得情绪有点激昂。只有洪深义愤填膺地发言，使我当时为之一惊，现在记忆犹新。他最后说：“希望蒋、汪两位先生不要学阿比西尼亚的皇

* 作者当时系汪伪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团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安徽省省长。

帝，口称抗战、抗战，却把黄金带到英国去了！”我记得我那次是和叶楚伦等从南京同轮赴九江的。7月8日船抵九江，叶楚伦在早餐桌上对我们说：

“刚才接到电报，北方的战火已经燃起来了，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响了。”大家为之愕然。第一次谈话会仍然如期召开，但嗅不出一丝战争气息，大人先生们个个都很笃定的样子。本来计划还想第二次、第三次依期开下去，由于情势日渐紧迫，蒋介石只好带着张群下山回南京去了。

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澎湃，由于非嫡系军人，特别是桂系的主张抗战，更由于害怕中共方面将取得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内外交迫，蒋介石才不得不采取了表面抗战、实际拖延的策略，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同时，也为了乘机更加扩大个人的战时权力，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式的包揽全国军政大权的统帅部，以何应钦为参谋长^①，张群为秘书长，好比左右丞相。下设一至六及管理七个部。其中第二部是“政略”部，以亲信熊式辉兼部长，陈布雷、周佛海副之。据周佛海向我透露，这个部主要是研究对日和平的。第六部（党务、特务）部长陈立夫，戴笠、徐恩曾，军统中统两头目，分任该部第一、第二组组长。把特务部门上升为“部”的阶级，这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虽然迫不得已已在“八一三”搞起了淞沪会战，他心里还是希望国际联盟出来帮忙，搞成国际调停的局面。英国驻南京大使许阁森本来想来尝试调停，不料他坐着汽车往来沪宁公路时，虽然汽车顶上漆了大幅英国米字旗，但是日军飞机看见这汽车有些特殊，怀疑这是蒋介石借用英国国旗来掩护自己在战地巡视的诡计，仍然无情地加以射击，许阁森受伤，调停的工作也不提了。

^① 应为参谋总长。

低调俱乐部

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长何应钦、张群，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正、副主任）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在1934年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建筑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间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便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进行“调解”，周佛海等人认为有机可乘，就向汪精卫并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和平之门不可闭”的建议。

1938年1月，国民党各方首脑在南京沦陷后陆续集结于武汉，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加紧进行。日方因蒋介石拖延时日，最后限期答复。消息传到武汉，汪精卫、何应钦、陈布雷、孔祥熙（当时任行政院长）^①等人，都已同意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此时蒋介石正往来于河南开封附近，亲自布置捕捉韩复榘。张群先用电话向蒋请示，汪精卫接着也讲了话，蒋已经说过“可以罢”，孔祥熙因为自己是行政院长，不甘寂寞，也拿着话筒说：“委员长，我还有几句话讲……”孔讲话历来是啰唆的，蒋听得不耐烦了，加以心中

^① 孔祥熙原为行政院副院长，1938年1月1日，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专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升任行政院院长。

有事，就说：“你们详细打电报再说吧！”这封机密电报追着蒋介石的专车，在电线杆上旅行，等到追上蒋时，日本认为限期已过，就悍然宣布，今后中日问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陶德曼的调停就此告吹。汪精卫逃离重庆后，曾于1939年3月公开发表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就是追述在汉口时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中日和平问题的经过，对于陶德曼的调停不成，其词大有憾焉！

高宗武秘密赴日

陶德曼调停虽已过去，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仍然鼓动汪精卫向蒋介石进言“和平”。蒋遇事惯于骑两头马，听了他们的话，正中下怀，遂决定秘密派高宗武（当时是行政院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赴香港，寻找门路试探日本的“和平条件”。这事蒋介石是背着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宠惠的，真是不可思议。

我那时本职是行政院简任秘书，兼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长，再兼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长由该处副主任周佛海兼任）。陈布雷命我设法为高宗武取得一张军用证明书，目的在于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因为非军职人员不能持用军方证明书，我便私自填了一张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给高宗武，随便写上“高特派员宗武”的头衔。蒋介石每月还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经费6000元（约合2000美元），陈布雷命我持蒋介石之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当时统制外汇，一律需经中央银行才能寄出款项，我只得又以军委会办公厅的名义致函中央银行照汇。

高去了两三个月，从香港回汉口^①。陈布雷命我前往机场妥慎迎接。我到机场时张群也在那里，我接到高宗武，亲自为他提行篋，以免特务检查，

① 高宗武自1938年2月去香港、上海后，曾于同年4月2日、5月30日两次回汉口报告与日本有关人士接洽“和平”的情况。这里指的是高第二次回汉口。

还送他上车，高随即与张群同车驱赴陈布雷处。高宗武带回日本所提条件内容，我不得而知。蒋介石投降心切，但又怕中共和人民不答应，同时大约日方所提的条件也过苛，使他无法公开接受。

高宗武住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待命，蒋介石既不表示让他再去，也不表示不必再去。周佛海、陶希圣怂恿汪精卫密商之于陈布雷，通知高宗武再往香港待命。陈布雷想，活动经费既未停发，说明高的任务尚未完结，叫他再去也不算错，就让他再飞香港。过了多天，蒋介石佯问陈布雷，高宗武现在何处？陈答已再往香港了，蒋亦不置可否。

当年7月，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孔兼总裁）忽然看到军委会办公厅请为高特派员汇款的文件，醋劲大发，居然向蒋介石提出质问：您派高司长赴国外，何以不让我行政院长知情？大攒纱帽。蒋只好耍赖，矢口否认他曾派高宗武出国。孔祥熙悻悻而去。蒋介石盛怒之下，写手条问军需署，高宗武月费是何人领汇？军需署据实签复。蒋又责备我，为何这样小事弄得中央银行个个都知道了。我虽然知道派高宗武出国是一件机密事情，但我哪里会晓得孔祥熙既是堂堂的行政院长，又是蒋介石的连襟之亲，蒋怎么会向他隐瞒这件事呢？事后据周佛海和我谈及，当高宗武奉派赴港后，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曾密问蒋介石：“委员长是不是派了高司长宗武的公差？他已久未到部了。”蒋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前次听说他夫人在香港生病，他曾想请假去看看。他现在不在汉口吗？”王宠惠碰了个软钉子，不敢再问。周佛海说，蒋介石曾一再告诫他：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蒋介石这种神秘诡诈的政治，只能说是特务政治。蒋介石一气之下，立即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并命他立即回汉口，以图掩饰。高宗武因别有怀抱，抗不从命。

高宗武几个月来，往返香港、上海、东京等地，已和日本陆军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生了密切联系。他回汉口时，周佛海、陶希圣得知有此路子，就和他密议：万一蒋介石不愿出面投降日本，就循此道路把汪精卫捧起来另搞一套。所以高宗武对蒋介石即不加理睬了。

艺文研究会

1937年冬，蒋介石、汪精卫退至武汉以后，日军并未穷追，蒋、汪就想在武汉喘息一时再说。次年初，蒋介石以做长期抗战为由，对行政院和军委会的组织机构与人事安排做了调整：任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张群为副院长，魏道明为秘书长；把前几个月划归军委会的第三部（重工业）、第四部（轻工业）归属行政院系统，仍以翁文灏任新设的经济部长，吴鼎昌回任实业部部长（旋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连军政、海军两部也仍归行政院系统，只在军令方面由军委会统率节制；军委会的第二部（政略）、第五部（宣传）、第六部（党务、特务）及管理部名义上均撤销，宣传归中宣部，特务分属中统、军统两局；改军委会第一部为军令部，使之成为独立的“参谋本部”；军委会仍设办公厅，以贺耀组为主任，下设秘书、参谋、总务、交际等处及机要室（我当时兼任秘书所长）。

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在心目中非常害怕国共重新合作后中共在文化宣传上占上风，并乘机扩充地盘和军队。所以周佛海、陶希圣等就献策，赶快搞一个暗中和中共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来执行反共任务。蒋、汪同意，就成立一个“艺文研究会”，任命周佛海、陶希圣为平行的总干事。^①其主要组织成员如次：秘书李厚徵（留苏学生，邓文仪系统），总务主干罗君强（以后李他调，由罗兼任秘书），编审组主干陶希圣兼，出版组主干叶溯中（CC分子）。另外还有两个组，是否叫“文化”“青年”记不清了，其主干是刘炳黎（复兴社分子）和刘百闵（CC分子）。

艺文研究会主要是以付稿费名义拉拢、收买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越多些。我记得拿过钱的有：叶青、郑学稼、

① 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研究总干事。

蒋廷黻、李圣五、梅思平、姚蓬子……对于当时甘做国民党尾巴的（青年、民社）两个小党，蒋介石密谕每月由该会各领津贴 3000 元。青年党由左舜生具领，民社党由张君勱具领。

该会也出资津贴给别人在各地办小报，如上海的樊仲云、湖南的易君左等。会中还出过一种艺文研究丛书，交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发行，主编人陶希圣等，印过四五种。

周佛海、陶希圣搞出一套口号，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这些口号完全是暗中对着中共而发。如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解释为要团结，不要闹党争，不要搞摩擦。又如说“抗战第一，胜利第一”，那就是一切要服从于军事的要求，要拥护最高统帅，从而引申到军令要绝对统一。

汪精卫介绍他的亲信、立法委员林柏生到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立变相的分支机构，叫作“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做收买、拉拢文化人的工作；并办一家“蔚蓝书店”，发行樊仲云的《国际周报》。同时，也叫高宗武在香港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以后汪精卫当汉奸，国际问题研究所、蔚蓝书店、日本问题研究会等，也随之首先成为汉奸机构。

艺文研究会的经费，每月 5 万元，是蒋介石下手谕命军需署从军事特支费内开支的。这年 12 月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从重庆经昆明逃到河内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停止该会经费，由我向陈布雷办清交代手续。以后仍利用这笔钱，由叶溯中办了一家“独立出版社”^①，刘百闵办了一家“文化图书服务社”，在抗战中出版了大批反动书刊，那是后话。

① 独立出版社在汪精卫等逃离重庆之前就已于汉口开办。它出版一种“战时综合丛书”，其第 2 辑就叫《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1938 年 4 月编成，6 月于汉口出版。

周佛海、陶希圣其人

周佛海原是破落官僚家庭出身的穷学生。湖南官费留日，由鹿儿岛高等学校毕业（相当于高中），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学经济。1921年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赴日本求学。因和杨淑慧同居，生活费用不足，就拼命翻译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来适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文化市场的需要，挣钱糊口。译文粗制滥造，如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连爪哇这一地名都弄错了。

1924年周佛海回国，应聘到广东大学^①当教授，月薪240毫洋。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应按累进额交纳党费70多元，杨淑慧认为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周终于借故脱离中国共产党。

不久，广东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邹鲁的风潮。周佛海思想右倾，辞职跑到上海，1926年春再往日本读完大学课程，随后又回上海教书。同时，他又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②。孤军社先出《孤军》杂志，后改名“独立青年社”，又出版《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2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

① 后改名为中山大学。

② “孤军社”是由留日学生何公敢、萨孟武等组织的团体，以宣传国家主义为宗旨，周佛海先后在《孤军》《独立青年》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中的阶级问题》《反共产与反革命》等文章。

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26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投靠蒋介石。这时蒋在南昌，由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汉口日人医院治疗。蒋介石回武汉传见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周两人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蒋即派周为新筹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将（该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我由罗增益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1927年初，武汉开始反对蒋介石，我请示了周佛海，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潮流走好了，其实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5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在轮船上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①，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詎知到上海即被杨虎、陈群捕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周佛海是谅解的，遂派员迎提到南京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周佛海投靠蒋介石后，写了一本《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获利10余万元。以后又当了一年多的军校政训处少将处长、三年多的总政治训练部兼行营总政治训练部中将主任^②，大肆进行“反共剿赤”的宣传工作。1931年国民党补选中委，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过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从1932年起，周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多年，镇压摧残进步学生运动，几次大规模解散学校。

1932年初，蒋介石、汪精卫重新合作。蒋对周佛海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周在文章中曾骂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周佛海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精卫亲近，不怕蒋介石猜疑，以致当上了

① 篇名为《逃出了赤都武汉》，1927年9月发表于《海涛》杂志第1期。

② 周佛海曾任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训练主任。

汪精卫叛国降日汉奸集团的“总参谋长”。

蒋介石对周佛海之坚决反共印象深刻，好感甚重，所以周当汉奸被判死刑之后，蒋终借词减刑，免其一死。周佛海曾和我说过，他是为了研究唯物史观而特意到京都帝国大学向河上肇博士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哪知愈研究愈出问题。他说，要相信二元论，既要唯心，又要唯物，单纯地主张唯物论，是不对的。

陶希圣原是北京大学读法科出身，以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由周佛海介绍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当政治教官，伪装“左”倾。1927年5月，武汉军校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紧急应变去堵击夏斗寅部的叛变时，施存统任该师政治部主任，陶为秘书，后又当该师的军法处处长。1928年周佛海拉陶希圣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认为他在武汉时曾大肆杀害拥蒋反共的同学，群起攻讦，几被扣押。周佛海见此情况，就让陶到上海来搞《新生命月刊》，参加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观点反动，主张不定。同时，陶希圣又参加了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1950年汪精卫在北方失败后，周佛海为陶求得陈果夫、陈立夫CC系的谅解，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未久又应北京大学之聘，往北平教书。汪精卫到南京任行政院院长时，任命陶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主编“农村复兴”丛书。1937年夏陶希圣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高宗武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

汪精卫逃往河内

周佛海、陶希圣极力鼓动汪精卫出来“跳火坑”，勾串汪的妻子陈璧君做内应。汪对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但他